

四、大陸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觀察

成功大學政治系王宏仁助理教授主稿

- 大陸成立亞投行支撐其「一帶一路」戰略，提供相關國家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合作平臺，抗衡西方金融體制；並藉此保持與周邊關係的和平穩定，降低「中國威脅論」之負面效應。
- 美方質疑亞投行之透明度，後續態度會否轉變，值予關注。

大陸在 2014 年 10 月 24 日於北京與 21 個國家簽署備忘錄，宣布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強調，亞投行的發起與成立，是要為「一帶一路」政策上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援助，並促進相關經濟產業合作。所謂「一帶一路」，係指「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大陸藉由東接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所貫穿而成的一條經濟帶。因此，亞投行的成立，不但可以幫助大陸推進自身的「一帶一路」計畫，同時藉由相關投資，例如公路、鐵路、發電廠和電信網絡等領域，與相關成員國之間進行合作、推動共同的利益。本文針對亞投行成立所可能帶來的成效與意涵，提出以下的觀察：

（一）亞投行可視為大陸在亞太地區安全戰略布局之一環

大陸官方對於亞投行成立的目的，僅強調是為了幫助海、陸兩條絲路上 26 個國家或地區的建設發展、推動與大陸共有利益的發展，以及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相互補充。然而，吾人不宜只將亞投行視為單一的、經濟性質的建制，而應該注意該創制在大陸整體亞太地區安全戰略布局中的角色。舉例而言，習近平在 2015 年 2 月 10 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時便強調，亞投行的主要任務是為了亞洲基礎設施和「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是要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對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做出補充；另一方面，同時成立的絲路基金則是要服務「一帶一路」戰略，按照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原則，搭建好公司治理架構，儘快

展開實質性的投資項目。

換言之，亞投行與絲路基金同時扮演替「一帶一路」戰略提供資金援助與經濟平臺的角色。此外，根據相關研究指出，亞投行的資本規模雖然沒有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或是世界銀行（簡稱世行）來得大，但是，從絲路基金與亞投行的相互配合、由大陸主導籌建中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擬議中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甚至考慮到未來大陸還可以用外匯儲備進一步增資亞投行來看，大陸對於「一帶一路」戰略執行的能力及企圖心，其實是相當具有競爭力的。

可想而知，亞投行成立所帶來的影響和效益，不會只有在經濟層面上。雖然大陸一直奉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原則，但也在 2001 年與俄羅斯和其他中亞國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尋求另一種模式的結盟方式。此外，被歸納至「一帶一路」計畫中的國家，多半是中亞、東南亞、南亞等開發中國家，與上合組織的成員國性質相似，其中甚至包括與大陸有邊界糾紛的國家，例如印度、菲律賓等國。由此可見，大陸的確希望藉由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來完成其政治上的戰略目的，亦即，保持與周邊國家的和平穩定關係、降低周邊國家對於「中國威脅論」所產生的負面反應。

（二）大陸藉由與亞洲的共同發展，抗衡既有的西方金融體制

大陸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規劃，是否為大陸對於亞洲地區、或甚至是全世界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深思熟慮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似乎仍不宜太早下定論。理由在於，大陸並不像美國在當時兩次世界大戰後一樣，擔負維護世界秩序與民主體制的責任，以至於後來發展出全球性的大戰略治理模式。對於大陸而言，最重要的還是如何藉由周邊和平與穩定的環境，幫助其內部改革開放政策順利進行。要讓周邊產生和平與穩定的環境，就必須在大陸崛起的過程中，與其他周邊國家共同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如同習近平 2012 年 7 月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世界和平論壇上所言：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從生存的角度而

言，大陸這種看似仁義寬厚的行為，其實也是在藉由與鄰為善的互動關係，來完成內部的經濟發展目標，而不能完全就論定這是某種「拉幫結派」（或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所稱的結盟-抗衡）的外交戰略。

儘管如此，大陸希望藉由與亞洲各國（涵蓋中亞、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區域），尤其是與開發中國家建立經濟合作關係，發展出不受既有西方體制制約的經貿、政治關係模式，早已經昭然若揭。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陸左派力量所鼓吹的「中國模式」、學術界追求的成立「中國學派」，以及業界人士所推崇的「北京共識」等，都顯示出支持一種有別於西方經驗的「中國經驗」論述。同樣地，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最先是透過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上對於「亞太自由貿易區」與「共建亞太夥伴關係」的共識才逐步發展起來。這個好處在於，除獲得其他亞洲國家的共識、降低反對力量外，還能藉由凝聚共識與力量，抗衡既有的西方金融體制所帶來的限制與干預。

大陸與其他亞洲國家對於既有西方制度的抗衡需求，主要是來自於2008年金融海嘯後，許多國家發現到美國所建構的國際金融體系已不再安全，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不但讓美元資產大幅貶值，還將金融危機輸出，讓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受害。此外，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對於新興國家的借款，均採取嚴格限制或是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要求；這讓許多包括大陸在內的亞洲國家，希冀現有體制能做出變革，或乾脆自己另起爐灶。當然，對於大陸自身而言，在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與體制內改革，早已經於事無補。亞行為日本所控制、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是美國所主導，而任何對於大陸有利的改革都只會被阻撓，或是緩不濟急。

（三）國際或西方世界對於亞投行的猜忌、擔憂與阻力

美國是反對亞投行創立的主要西方國家。除公開反對外，據報導，美國還私下要求澳洲、韓國、印尼不要表態支持亞投行。美國反對的表面理由在於，亞投行不具備該有的國際監管標準及透明度，以及新設立的亞投

行可能降低國際貸款標準，並提供貸款更為寬鬆的環境、人力和其他保護，來跟現有的多國貸款方抗衡。但是美國反對的真正原因，則在於美國對大陸長期的不信任，擔憂大陸將藉由控制資金，進而控制這些相關的亞洲國家，並利用經濟實力將這些國家帶入大陸自身的政治軌道，遠離美國的控制。有些西方媒體報導，將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計畫類比為大陸版的「馬歇爾計畫」，多少隱含著對於大陸崛起的一種敏感論點，以及西方輿論認定大陸將有與強權美國對抗的意味。

此外，由於日本在亞洲銀行、世界銀行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這兩個組織又與大陸主導的亞投行在投資項目上具有重疊與競爭（例如能源基礎建設、交通建設等等）；因此，日本將會是美國之外，亞投行的第二個最大反對阻力。簡言之，大陸方面雖然片面希望將來亞投行與其他全球和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關係，是互補而不是相互替代；然而，從美國、日本或是現行國際金融組織的本位立場而言，大陸所支持的亞投行，早已經成為「中國威脅論」的另外一項新事證。